

## 论陶渊明和梭罗的诗学走向

米彦青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曾躬耕陇亩的文人代表,陶渊明和梭罗都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诗可以兴”是他们共有的诗学基础,不过梭罗在体验自然后又重新回归尘世,成为有内在精神思想脉络和政治承担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呈现的是“诗可以群”;而陶渊明在认清世人追名逐利的本性无可更改后,他逃离尘世去追求精神上的“洁癖”,他的笔下渐呈“诗可以怨”的特点。

**关键词:** 陶渊明;梭罗;回归自然;诗学走向

**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14)01-0079-05

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曾躬耕陇亩的文人代表,陶渊明和梭罗都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诗可以兴”是他们共有的诗学基础,不过梭罗在体验自然后又重新回归尘世,成为有内在精神思想脉络和政治承担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呈现出“诗可以群”的特征;而陶渊明在认清世人追名逐利的本性无可更改后,他逃离尘世去追求精神上的“洁癖”,他的笔下渐显“诗可以怨”的特点。

对陶渊明和梭罗的比较研究,此前已有论文系统论述,但仍有可议之处,本文试从自然角度对他们的诗学走向做一论述。

—

梭罗·H. D.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是美国作家、思想家。他生长在波士顿附近超验主义思想运动中心康科德镇,父亲是小业主。20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教师,从事过各种体力劳动。梭罗在学生时代与爱默生相识,在爱默生影响下,阅读了柯尔律治、卡莱尔等人的著作,研究了东方的哲学思想,同时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形成了一套独立见解。

梭罗的著作都是根据他在大自然中的体验写成的。1839年他和哥哥在梅里马克河上划船漂游,写成《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又称

《康可德及梅里马克河畔一周》)(1849),发表了他对自然、人生和文艺问题的见解。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或林中生活》(又称《瓦尔登湖》,1854)记录了他于1845至1847年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度过的一段隐居生活。在他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汇融合,浑然一体。他是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梭罗的文章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内容,在美国19世纪散文中独树一帜。他的思想对英国工党、印度的甘地与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瓦尔登湖”出自天然,离康科德镇有一英里半。以《瓦尔登湖》和《在康可德及梅里马克河畔一周》而在美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梭罗,从这一小小的野生湖泊的生命律动当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每一处细节和情景,体会到了时间变更唤醒生命时的激动,以及时间残留给生命的痕迹的意义。不仅如此,他将自己的内在生命完全消融、投注在身边的这小小的一湖水上,他在观察湖畔时间的“流逝”之中,一点点地倾听、观察着生命成长的声音——时间从来不曾真正流逝,流逝掉的,是属于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当然,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顺利地完成的。1845年3月,已经28岁的梭罗开始在瓦尔登湖畔筑建茅屋,同年7月,他从爱默生家搬进筑好了的湖畔小屋。但是,他为此付出了代价——1846年,因

收稿日期: 2013-10-12

作者简介: 米彦青,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拒付人头税,梭罗被捕入狱,出狱后他游览缅因森林,并于次年9月迁出瓦尔登湖畔的小屋,重新借住在爱默生家。

梭罗选择了纯净的湖泊,在此让文明人恢复自己最原始本真的生命活力,这种选择与他对这片风景的熟悉有关。而这种稔熟与选择绝对取决于梭罗与爱默生的交往,没有与爱默生的亲如一家的交往,梭罗就不会有机会深入这方湖泊,了解生物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从而感知这片风景,以附丽自己的理念。这片山水是解读梭罗的索引。在瓦尔登湖畔,梭罗沉浸在一种“物我两望”的个人精神世界之中,以一种强大的个人力量,将自我自然地社会和历史中拉扯出来,消融在瓦尔登湖畔的树木水草之上,追求一种息心静性、清心寡欲的生活方式。梭罗主张精神世界和自然界应该平等地交流和沟通、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自然的丰富和博大让他发出回归自然的号召。所以,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他说:“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超验主义者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信你自己’这句爱默生的名言,成为超验主义者的座右铭。所以,当梭罗独坐幽林,行至水穷时,他感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心灵默契,是一种宁静以致远的清闲,是心随桃花流水宛然远去,从而洞见宇宙万物本质后的空明灵澈。这种诗意的栖居,让梭罗坐看的不只是水流云在,更是人生百世的乘运随适。他以无意识的态度应和宇宙的无意识,以视境和听觉上的超常来展示灵魂的极度自由,体验到自我的无为与山水的无为的默契,而深得天籁静寂之神谛,无意无为而自生自化,这样成文,其中自有灵气和静意。”

当梭罗离开瓦尔登湖后,湖畔的声音,始终萦绕在重新回到世俗社会之中的他的耳边,而不仅仅只是留驻在他的湖畔日记中。与陶渊明不同,梭罗从来就“不想过一种隐逸的生活”(《我为什么到树林中去》),他只是要体验自然,要在自然中发现生活的本来面目。19世纪的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主动地将自己的知识体系疏

离于体制或官场之外,所以在旁观意义上可以对政府进行更好地审视与监督,这种社会责任感是他们的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梭罗也不例外。所以走进自然的梭罗,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践行来告诉世人生活中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生活中的各阶层应该怎样自然索求,自然相处,自然维护自身利益。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凝思和自我放逐,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够创造出一代人对于美、对于生活、对于自然以及对于历史的新想象。因为他始终在思考:在一个文明已经崩颓,美好的田园视景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人类要用什么样的力量和什么样的形式,来建立西方理想的现代性?

这样,与世俗体制和法则的冲突,就将梭罗的精神气质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诗人或者自然主义者——依靠本能的生命力量抗拒叛逆社会体制、群体意志的个人,转化成为一个深刻的、具有内在精神思想脉络的自然主义者。《论公民的不服从》,一下子将梭罗的思想提升到了与卢梭的思想同等的高度,并将梭罗从一个逃避现实社会的近代隐士,转化成为一个以特立独行之姿张扬个人价值及立场、对体制价值和群体法则表示怀疑及不遵从的具有自觉思想和思想力的现代人。正因此,梭罗的诗学,从此由表述个人主观感受世界的“诗可以兴”转而向“诗可以群”发展了。他的质疑无疑树立了那个时代知识人对体制的思考姿态,而这种姿态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绝对不逊色于陶渊明的思想带给中国人文知识阶层的影响。

## 二

文学具有感召和呈现自然的力量。陶渊明和梭罗都明白现实人生的残酷,甚至有切身体验,但是如何从这样一个残酷的经验里,去凝聚、去抽离,然后行之于一种文学或美学形式,这是另外一重挑战。

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东晋著名诗人,是中国古代田园诗歌的开创者。据传其曾祖为东晋名臣陶侃,后家道中落。他先后担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小官,因不满官场黑暗,辞官归隐。从此躬耕自资,直至贫病而卒。辞官彭泽标志着陶渊明终于从仕隐矛盾中解脱出来,是他崇尚自然思想的胜利。

当陶渊明远离红尘扰攘后,他依旧需要来自知识积淀过程中的对自我精神上的点拨与导引,需要群体精神生活中的思想拉扯与激荡,否则,他就会完全沉浸在自我封闭式的情感幻想与精神冥想之中。所以他在自己的“桃花源”中依旧关注世情和社会,他不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精卫衔微木》)。虽然在自然中,陶渊明的生命由矛盾转向和谐自得,中年后更是认清了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仕途,但是他的逃离俗世还是令自己的内心时时纠结。因为,“逃脱当然是一种自我欺骗:他永远不能真正逃脱,永远不能成功地忘掉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幻象总是要被揭穿的,他如此坚持不懈地声称它的现实性,实际上正是因为他心底里已经意识到它是幻象”<sup>[1]</sup>。陶渊明对现实世界的难以忘情,其实,也正说明他早已意识到桃花源只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现实是令人悲哀的,即便是在魏晋诗人群体活动最鼎盛的时候,陶渊明身上那种根深蒂固的忧郁,或者确切地说是忧患意识,始终成为一道将他与其他诗人的残喘隔开的精神和情感之墙。他始终关注着自我、内在与人性,关注着个体、历史与精神处境。这种关注,在魏晋的知识分子当中,陶渊明并不是唯一,但是,陶渊明用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以及最终选择的生存方式,将他自己身上的独特性彰显出来,并为一个变动的时代涂上了一抹精神的亮色。

借用《楚辞》的《渔父》来理解陶渊明,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陶渊明之所以自我放逐,就是因为世人都是稀里糊涂的,而渔父答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因是自我的放逐,所以当陶渊明在经受痛苦的肉体生命考验时,有了这答案在心中,他可以焕发出一种对历史不同的承担的愿望,而且因为现实的忧患是如此深远。陶渊明作为一个有志的抒情文人,他企图借他的书写,借着生活的美学,以及田园式生活体味的实践的美感经验的交会,塑造一种安身立命的可能性。而陶诗的引入处正是在于山穷水尽的素朴本色中,呈现一种审美的抒情的境界。在潜移默化中,让读者感受到洁净的语言符码里召唤出情动于中的想象空间。陶诗的好并没有特别精彩之处,而是强调悠然而有余韵。

委运自然——悠然而有余韵的书写是陶渊明诗学思想的核心。陶渊明在辞去彭泽令之初,作有《归去来兮辞并序》一文。该文总结其前半生的仕隐生活,又揭示了其归耕田园的独特意义。

在陶渊明看来,比起官场,乡村生活才是一种更符合人性、真正人道的生活,乡村是人类真正安身立命的家园。强烈追求精神自由的陶渊明认为,只有在乡土生活中才能保证自己精神的“洁癖”<sup>[2]</sup>。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文学语言的形式,把隐居田园的深刻意义做了全面阐述的人,并将其提到了完全自觉、富有理性的高度,从中展现出了自己的人格追求和思想素质。“《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因此它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sup>[3]</sup>

由于陶渊明的“隐逸”没能摆脱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典型的退隐模式,即社会环境的黑暗压抑所致,他的“隐逸”同梭罗由个人推而向外的以试验求认同的“隐逸”比较而言,“独善其身”的情绪更浓。陶渊明的“隐逸”从开始到履行都没有旗帜鲜明的目的性,它虽然是陶渊明的主观自愿,但它毕竟也是陶渊明早年入世之举“行而不得其道,入而不得其门”的落戟沉沙之物,所以抉择的指向是朝内的,首先为的是自我。<sup>[4]</sup>“如果进一步从世界观和生命意识的角度,结合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时代予以观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似乎又不仅是一种生活情趣、一种心理状态的抉择,而且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他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追求。”<sup>[5]</sup>陶渊明的田园山水诗所以能够读来让人“身世两忘,万念皆寂”<sup>[6]</sup>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诗歌中反映出来的是,人顺应自然的惬意和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淡泊。徐复观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指出,中国历代文人的生活道路,历来有“出世”与“入世”两途,作为“出世”的主要途径之隐逸者,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看是信奉佛教的,然其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极庄子的清静,已全体成佛。佛则并空天地,庄子则期于合天地而止。”<sup>[7]</sup>而人顺应自然就是“合天地”的最佳途径。陶渊明的隐居和梭罗的隐居都是“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的表现。

### 三

陶渊明和梭罗都有一种在沉静与痛苦之中面对自我的清醒、勇敢与坚定,一种寻求内在解决的个体主观努力。他们的人生观体现出了对世俗社

会的一种宁静的超越。黑格尔曾于1818年12月在柏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sup>[8]</sup>梭罗认为,大部分人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怪圈,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魔鬼所赐,还是上帝所赐,然而却稍稍草率地得出结论,认为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赞美上帝,永享他的赐福。梭罗和陶渊明都相信,只有经过自己的践行,生命的真实性才能得到确认。

陶渊明和梭罗都曾细致入微地体验自然,但是面对汹汹人势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是陶渊明和梭罗所共有的人生观。所不同的是,梭罗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陶渊明是消极的。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所谓消极,自然就是在看破红尘后对人类没有信心。相较梭罗,陶渊明的内心要复杂得多,孤独和悲凉是他无药可医的心病。因为在自己拒绝的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红尘流离中对金钱和权力趋之若鹜的芸芸众生。出于人情和常识,他知道自己无法阻拦别人,也没有权利和能力阻拦别人的趋之若鹜。因之,当自幼受着儒家伦理教化的陶渊明终于决心放弃仕途,返归自然时,我们从他的诗歌中读出的不仅是欣喜,更有欣喜的后面深沉郁结的失落和孤独,及其所指向的对于人世间的决绝。从此,陶渊明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躬耕陇亩的生活,而在内心,洪荒万年,他独对苍穹,忍受并品味生命悄然流逝的大寂寞。

自然或艺术的救赎力量常常使历史在它的残暴和不明之处,能够产生一种新的观照。瓦尔登湖是梭罗观照的起点,南山抑或桃花源也是陶渊明观照的起点。他们都曾把对于未来生活的思考寓于某种形式的山水之隐中。隐是传统的、触动灵感的母题,是安顿士人生命、文化的绝对信念或姿态。无论是陶渊明的山隐还是梭罗的水隐,都是创作里面念兹在兹的历史转折点。陶渊明和梭罗的隐都是精神上的逃逸。不同在于,陶渊明的消极与逃逸表明的是自己的政治态度,而梭罗体现的则是宗教式的参玄,然而他们都在精神的深处寻找一种文化的呼应,是个人的本色,但诗学走向由此却大不同。借用中国抒情传统诗学的表述,他们俱是从“诗可以兴”起步,梭罗的抒情主体经过了历史因素(西方现代性进程中的对自然的破坏或者说是对于安宁人生的解构)的刺激,转而去寻找一个更积极、有力的思辨、发言位置,而这个积极的主体位置,对梭罗而言,是一个启示性的主体,一个群体性的主体,“诗可以群”在此处

得到了很好的注释。梭罗写下的《论公民的不服从》等著作后,他的个人的抒情文学(《瓦尔登湖》)就转变为群体的主体的历史,他的作品从此呼吁社会,注意事功。在这样一种抒情文学到史传的观察下,梭罗是有他的政治承担的。而陶渊明从此内转,更多的在诗文中呈现出“诗可以怨”的特点,以文字表述自己内心情志。历史的诡秘在于,大事件下的人生体验是不同的,最终做出的抉择也不同,“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士志于道’,他们的职责是抗衡‘势’(政治集权),维护‘道’(社会良知)”,对于西方人来说,知识人的责任是对权威的传统质疑,监督和批评,<sup>[9]</sup>而东方的中世纪的知识人对权威的挑战的选择通常是独善其身。

无论是怎样的“出”、“处”,他们都呈现了一种对抗的姿态。不同在于,梭罗对抗的是西方现代性,他想要在这现代性中建立一种理想。而陶渊明对抗的是人格的陨落,他想要在中古乱世中建立一种理想。他们的共性都在于对抗一种暴力。一种来自知识阶层的良知的呼唤,让梭罗和陶渊明不与时代合作,在历史的拐点上,他们都是暴力的反抗者。他们的诗学的最终走向,就是“能够以超越的眼睛,透过尘网,把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看成一体”<sup>[10]</sup>。

陶渊明给后代士人的启示,与梭罗的著作多少相似,虽然内容大异,但诗学思想基础相近的因素还是有的。追随陶渊明的人未必都有这样的情怀,以致他被许多人所误解,那也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陶渊明的诗文还是梭罗的散文,文字的描述都有极强的画面感,在阅读中不会让人产生芜杂的感觉,反倒觉得是精神的调色板的移动。陶渊明知道未来的期许有虚妄的地方,于是退到田园,退回书斋,与农人为邻,与笔墨为伍,从身体的劳作中寻找生命的质感,或从文字的排列组合里体验生命的内蕴。梭罗讲瓦尔登湖的隐乐,其实未尝不是在讲他的陶氏体验。不同于其他学者对他们诗文的读解,笔者更期望能借此寻找他们作为“士”或说知识人的原点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笔下,那些生命的体味与神往,是打动无数后人的地方。最打动人心的,始终是那些贴近其人生境遇的诗学理念,更直接地反映着他们在某一历史瞬间的感受与命运,以及他们以之回应冲击、震撼的思想。因为他们首先都被自然被生活的当下打动过,所以才能在叙述中打动别人,他们无意中做到的此点,才正是最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或许就是陶渊明和梭罗共有的“精神气质”。梭罗写《瓦尔登湖》用的是智者的目光,诗情内嵌着,最感人的是那

些呼吸间的活灵活现的场面。陶渊明和梭罗的大境界不是简单的非议与认同,而是在诗文语言的组织里隐藏着对人与事的理解。在他们身后,文人因为没有耐心静观的缘故,只能表象地描写逝去的存在。而在陶渊明和梭罗的笔下,我们则可以清晰地感知他们对于生活的珍重和凝视,这份岁月静好的神圣感是更为感动人心的。

陶渊明与梭罗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背景性的差异:如果说陶渊明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正在遭受质疑的儒家伦理教化被颠覆的时代,那么梭罗所要面对的则是如何接受与消化现代性的挑战。梭罗需要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去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然而从他们笔下对于自然质性的肯定,都体现出他们对于“真淳”基本价值的认同。著名学者浦薛凤在其自传的序中写道“老式中医,看病先按脉搏,正同新式西医一样。看手纹、摆纸牌,实与批八字、算命卜卦仿佛。古今中外,文化与生活方式,固有其形式与程度上之异同。仔细推敲,恐是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两者之中,大抵同中有异,较为肤浅,而异中有同,较为深刻。”<sup>[11]</sup>虽是一己之观点,却讲出了东西攸同的事实,因为人同此理,无关政体、信仰、习俗和历史。譬如,对上天的敬畏、先人的祭祀和逝去人们的追悼,或一地一风俗,内容不一,然仪式在,这就是“异中有同”。过多地纠缠同中之异,反倒容易失去比较的目的。

总之,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梭罗,他们都曾经过

后天尘世中的“伪我”生活,并对此感到厌倦,所以力求返归自然,寻求一个“真我”。在对自然山水的描述中,他们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也感受到了人性的复归。两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真纯自然之美,尽管生命曾颠沛流离,困顿疲累,但当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一定可以回到永恒的安详和清静之中。

#### 参考文献:

- [1]〔美〕宇文所安. 追忆[M]. 郑学勤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 [2]吉川幸次郎. 陶渊明传[M]. 东京:新潮文库, 1958.
- [3]袁行霈, 罗宗强. 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4]李洁. 从对“朴”的诉求看梭罗与陶渊明的“隐逸”[J]. 兰州学刊, 2007(12).
- [5]鄢化志. “归去来兮”辨[J]. 文艺研究, 2001(3).
- [6]胡应麟. 诗薮·内编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7]陈治安. 南华真经本义·叙[M]. 清刻本.
- [8]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9]朱坤容. 杂志与思想: 近现代日本知识人的一个侧面——以日本《思想》杂志(一九二一—一九四五)为中心[J]. 读书, 2011(10).
- [10]施友忠. 二度和谐及其他[M].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 [11]浦薛凤. 浦薛凤回忆录[M]. 合肥:黄山书社, 2009.

【责任编辑 齐昆】

## On the Poetic Trend of Tao Yuan-ming and Thoreau

MI Yan-q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As rare writers of going for farming by themselv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Tao Yuan-ming and Thoreau advocated the return to nature, and sought an independent spirit realm in nature. "Poetry can prosper" is the basis of their shared poetics, but Thoreau experienced the nature and then returned to the world to become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and the political commitment of the inner spirit of the naturalist. Therefore, his works gradually rendered "Poetry can group". Tao Yuan-ming found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the world to chase fame nature, and he fled the earth to the pursuit of the spirit sanitation. He finally took a thinking look of "Poetry can complain".

**Key words:** Tao Yuan-ming; Thoreau; return to nature; poetics